孔祥星先生访谈录 *

孔祥星　霍宏伟　卢　宇

霍宏伟、卢宇（以下简称“霍、卢”）：孔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中国知名的文博考古学者，请问您是怎么走上文博考古之路的？

孔祥星：先谈一下我的上学经历吧！为什么要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呢？因为我小时候在武汉生活，喜欢看武汉市汉剧院演出的古装戏。再一个就是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就报考了文科。当时北大历史系是先上一年课再分专业，我选择了考古专业。

霍、卢：众所周知，考古专业很重视田野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实习，两者共同影响着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作为前辈，您方便讲讲求学中的相关经历和确定毕业论文选题的过程吗？

孔祥星：大学期间，我多次参加了考古发掘实习。1958年，在吕遵谔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与56级的学长一起参加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著名学者贾兰坡先生担任考古发掘队队长，吕老师任副队长。同学们白天参加发掘，晚上上课，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等先生都给我们讲过课，让我们这些刚刚学习考古的学生倍感惊喜。其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还来到考古工地视察，不仅与我们一起发掘，还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的课，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1960年，我们班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实习，主要任务是讲解中国通史陈列。

1961年，在李仰松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参加了位于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的发掘。这是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该遗址时代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北朝，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价值。1962年，我们班快毕业的时候，我将研究方向确定在隋唐考古领域。我的毕业实习是在陕西省博物馆整理发掘的隋唐墓葬资料，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完成的一项重要墓葬资料整理工作，由宿白老师和陕西文博考古界的一些先生们指导。当时，宿白老师给我们参与工作的四位同学指定了整理范围：孙秉根（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墓葬形制的资料整理，王仁波（毕业后留校攻读研究生，后分配到陕西工作若干年，再调动到上海博物馆）负责出土陶俑的整理，李知宴（毕业后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后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陶瓷器，我负责墓中出土其他金银铜铁等质地的器物。可以看出，他们三位都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课题，我负责整理的则比较零碎和分散，每种器物的数量也不多。

这样的任务分工，在我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明显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三位同学主题明确，资料较为丰富，写起来比较顺利。由于我负责整理的资料分散，无法进行某一专题研究，很难形成一篇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因受刊物版面限制，谨选取部分内容先期发表。

文。于是，宿白老师只好让我选取隋唐铜镜撰写毕业论文，但我们在陕西整理的那批墓葬中出土铜镜数量并不多，必须充分利用其他出土文物和传世的丰富资料，考虑到研究必须深入，范围不能太广泛，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隋和初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由于离开了毕业实习整理墓葬资料的基础，这篇论文没有达到优秀水平。

霍、卢：但从现在来看，这恰是您古代铜镜研究的序幕。

孔祥星：的确如此。谁能料到，却是这篇论文开启了我后来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的序幕，而且铜镜研究成为我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领域。因此我常常感叹：人的一生，除了自己努力以外，也会遇到一些契机和偶然性，这些契机很有可能影响你的人生。在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中，几次契机让我始终没有离开文博单位，在文博领域的岗位上工作了一生。

霍、卢：您是大学毕业后直接攻读的研究生，可以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吗？

孔祥星：对。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班上二十四位同学中有八位报考了研究生，三位留在本校。我作为宿白老师的研究生，攻读隋唐考古方向课程。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研一时导师让我给没有标点的《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标注标点，以提高我阅读古文献的能力。再就是外文课程，大学期间我学的是俄语，这次选择的是日语，因为日本学者在隋唐考古领域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

第一年，除了上基础课、聆听导师的指导和自己看书外，我还在导师的安排下进行了两次实习。一次是到河南洛阳整理出土的隋唐墓葬资料，由当时洛阳的考古专家蒋若是先生亲自指导，我收获良多，最后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墓葬资料和笔记。另一次是到湖北省博物馆整理隋唐墓资料，非常遗憾的是刚刚把这些墓葬资料一座墓、一座墓开箱，将出土文物排开之后，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必须赶回来参加农村“四清”社教运动，错过了一次很好了解湖北隋唐墓葬的机会。另外，导师还让我系统地收集湖南出土隋唐墓葬资料，我也作了较为详细的笔记。因此，我的研究生论文自然确定为《隋唐墓葬的类型与分期》。

我们考古专业的一些师生被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在那里“清查”了三个多月，又被安排到顺义县天竺公社天竺大队继续“清查”，没想到竟然在那个地方呆了一年多。研究生规定是三年学制，实际上只学习了一年多时间，许多课程都没有完成。尽管如此，我认为研究生第一年导师宿白先生的亲自指导、言传身教，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指明了正确的路径。

霍、卢：那是在什么契机下，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工作的呢？

孔祥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生很少，我的师兄郝本性，是唐兰先生的研究生，他为了学习更多的东西，毕业时间延长了一年。阎文儒老师指导王仁波，苏秉琦老师指导郭大顺。四个同学中，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能是这个原因，在我跑回学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收到了分配工作的派遣证，一看派遣证，不是到中国科学院（当时考古所属于中国科学院），而是被分配到了文化部下属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当时就问文化部工作人员，他们说这个博物馆最缺的就是研究生，所以将我分配到该馆。后来我才知道，1966年以前我们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只有14位，因此我们这些人在当时就比较受重视。我

在隋唐宋元研究室从事陈列展览内容设计工作。

霍、卢：那您在隋唐宋元研究室工作过程中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孔祥星：有，而且这件事对我业务能力的锻练和提高很重要。1973年10月20日，我馆收到了湖北省大冶县铜绿山矿革命委员会写来的一封信，还寄来一件铜斧头，说这是岳飞练兵的武器。这属于我们研究室的任务，我又是学考古的，博物馆就派我去铜绿山了解情况。

回到北京后，我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后，也向考古研究所的夏鼐所长汇报。让我特别激动的是，他真是一个专家型领导。我带了铜绿山矿的地下坑道分布图，夏所长边问我一些问题边看图，整整两个小时，十分重视。文物局后来也要找一些专家开会，研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情况。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会议竟然没通知我和范世民。为了保护这个遗址，我向文物局询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到现场考察的人？专家又没到现场，也不看铜斧和图纸，他们怎么审议。听了我的意见后，开会时，我们将收藏在我馆的铜斧和图纸带到会上，并向专家汇报了我们去铜绿山的调查情况。

后来铜绿山矿冶遗址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负责发掘，就没有我们的事了。但是，发掘告一段落后，我还是应邀去黄石参加了一次如何保护、展示这个遗址的论证会，我们希望在原地方保留遗址，建设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这两年遗址博物馆新馆修改陈列，他们也专门派人来京请我们口述当时去考察的历史。尽管我没有参加后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73年决定派我们去考察是极为明智的决定，首先发现了这是一座时代较早的古矿冶遗址，并初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此后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这是一个在国内外均有影响的重大考古项目。从这个项目的考察和我们当时做的一系列工作，可以看出我在北大学习的考古知识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1]。

霍、卢：是的。下面我们想请孔先生谈一谈个人的学术研究情况，您在铜镜、吐鲁番文书、清代王府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方便整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孔祥星：关于本人的学术研究情况，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吐鲁番文书研究。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发掘的墓葬里面出土了许多古代文书。1975年，这批文书被调到北京进行整理。整理组组长是武汉大学的著名学者唐长孺教授，组员前前后后有武汉大学的老师和唐教授的几位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沙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雍老师、河北大学胡如雷教授，新疆方面有穆舜英、吴震、李征等先生；还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因为我是学隋唐考古的，有幸参加了这次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

由于我馆陈列任务的需要，我参加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整理组。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这次整理工作非常重要，在这些学者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影响下，我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大大提高。唐长孺老师非常严谨，要求每个人首先对分配给自己的文书进行释文，然后小组开会，由唐先生主持，对释文逐一修改，最后确定文书的内容，撰写提要。

‹1› 有关内容可详见范世民、孔祥星《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发现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1期。

霍、卢：原来您是这样在铜镜研究领域外开辟了新的方向。

孔祥星：对。为了熟悉这些文书以进行研究，我晚上回家又将审定过的一些文书有针对性地抄写一遍，一张一张，抄了不少件。因为我在读研究生时学了一点日语，唐先生根据我这个特点，指导我关注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于是特别注意他们利用了哪些资料、有什么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并且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问题与我们这次整理的文书加以比较，明显感觉到这些科学发掘、认真整理的资料内容十分丰富，能够发现问题、找到突破口。例如，我看到一位日本学者充分利用在日本收藏的几件吐鲁番出土的有关租佃契约方面的唐代文书，撰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而我们这次整理的租佃契约文书有六十多件，我便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综合性的宏观研究，撰写了一篇吐鲁番地区唐代土地租佃关系的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该地区唐代土地租佃关系的全貌。又如日本学者利用吐鲁番文书撰写了一些唐代社会基层状况的文章，而在我们整理的文书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于是又写了一篇关于唐代里正的文章，主要研究吐鲁番地区唐代基层管理体系的结构。另外，我发现文书中也有唐代交通管理的内容，于是又写了一篇唐代交通组织长行坊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我后来评职称的时候，主要提交的就是这些文章。还有一件事，我很少提及，评审职称后，国家文物局下发评审通过的二十多人名单中，包括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职称是副研究员，其他人均为副研究馆员。我分析，这应该是当时我写的研究文章比较多，特别是有关吐鲁番文书的一系列论文。

第二阶段，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文博考古学界一提到我的名字，是作为铜镜研究学者为人熟知的。前面我已谈过，在西安实习时期我负责整理的资料没有办法写论文，毕业论文写的是唐代铜镜。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在西安召开。我把大学毕业论文修改、扩展，向会议提交了《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的文章，后来发表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该论文集共计收录了46篇文章，附有16版图版。没料到的是，大概是因为从事考古的人比较重视类型学和年代学的研究，我这篇论文受到格外重视，在论文集16幅图版中，我的文章配图占了4版，更加形象、直观地展示了论文内容。

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我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到了铜镜方面。文物出版社的孙关根先生向我约稿，希望撰写一本《铜镜史话》，当时他正在策划一套如《铜鼓史话》等有关“文物史话”类的著作。我说我们是学考古的，问他能不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对铜镜进行一些类型学、年代学的深入研究，他同意我的想法，但要求文字不能超过8万字。为此，我向宿白老师汇报，听取他的指导意见。出乎意料的是，宿老师让我继续做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大学问，不要做铜镜研究。我的导师知识面广、重视文献资料，所以我给他提出撰写铜镜著作的事，他就不太高兴。考虑到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的状况和我们所学的专长，这次我们没有听老师的意见。

霍、卢：据我所之，您当时被公派去了德国。

孔祥星：不巧的是，这个时候国家文物局要派我去德国半年，担任中国文物外展的随展组成员。于是，我只能依靠夫人刘一曼先收集铜镜资料，她每天晚上将发表在《考古学报》《考古》等考古文博期

刊上的资料抄录在卡片上，花了半年时间，装满了整整三个卡片盒。当时条件就是这样的，只能刻苦、耐心，一张张、一张张地抄写。我从德国回来后，资料积累得比较丰富了，我们就开始分工撰写铜镜的书，刘一曼撰写汉代以前的部分，我负责汉代以后的。1984年，文物出版社顺利出版了《中国古代铜镜》这本书。

这本书一出来，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好评。因为这是中国首部全面利用科学考古发掘资料进行铜镜类型学、年代学研究的著作。因为考古研究所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铜镜专业方面的书比较多，有此条件，我们尽量将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有关铜镜的研究成果融汇其中。但是因为篇幅字数的限制，许多问题都无法深入展开。另外，我还要透露一点经验，我平时看报刊杂志时，就比较注意摘录一些观点、词汇，也关注书评之类的文章。今天采访我的霍宏伟先生也是非常认真做学问的，他每次到我们家进行学术交流讨论时，都拿一个本子做记录，让我特别感动。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在写这本中国古代铜镜书时，既要注重学术性，也要考虑增加知识性和读者的阅读性，行文就突破了一般的规范格式和程式化，内涵较为丰富，文字也比较生动。后来，台湾一家出版社职员到文物出版社询问："我们看到了你们出版的姓孔的、姓刘的合著铜镜书，他们能够把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写得这么生动，我们想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经过与我们协商版权问题，台北艺术图书公司于1994年1月出版了《中国古铜镜》（《中国古代铜镜》繁体字版）。

霍、卢：这本书更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好评。

孔祥星：是的。日本学者也通过文物出版社和我们联系，要将此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这应是中国学者研究铜镜的书首次在日本出版。据我所知，相继在日本出版的铜镜著作还有《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霍宏伟、史家珍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在这里，我想和你们谈谈，日本学者为什么重视这几本铜镜著作？多年来，我在阅读日本学者的著作时，深切感到他们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注意文物资料的集成工作，着力发掘资料，研究资料的特性，体现原发性思维和原创观点。例如，《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中发表了日本学者最为关注的三国六朝铜镜；而《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中不仅有丰富、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而且霍宏伟还在书中撰写了《洛阳出土铜镜资料长编》。我们的著作也收集了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并对其进行了研究。所以，日本选择这几本著作出版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们的研究传统和方法有关。

为了使日本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古代铜镜，日本翻译此书的学者向我提出，能不能让他们在书中以注释的形式增加铜镜的一些基本知识。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让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古代铜镜的重要性，也能更好地展现我们这本书的价值，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为了保证原书的完整性，原书的注释和他们补充的注释要有明显的标注。1991年，由高仓洋彰、田崎博之、渡边芳郎翻译的《图说中国古代铜镜史》（《中国古代铜镜》日文版）在日本出版（日本有限会社海鸟社），日文版装帧精美，开本也大，因为增加了许多注释，内容更为丰富。2003年，安京淑翻译的《中国古代铜镜》韩文版发行（韩国考古学专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铜镜》一书在国内也颇受欢迎，因为中央和省市的各级考古所、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收藏有铜镜，有的单位收藏铜镜多达数千面。此书为他们研究铜镜的类型学、年代学提供了参考。后来，文物出版社孙关根先生又与我一起策划出版了一套图典性质的文物著作，我们承担《中国铜镜图典》的编写，按照中国历史发展序列和各时代流行的铜镜类型，一图一说明。我们吸收中外研究成果，力求出版一本规范性、典范性和实用性俱佳的工具书，以推进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工作。令我们感到特别惊喜的是，铜镜图典出版之前，文物出版社还特别进行了宣传活动。之后相继出版的瓦当、佛造像等不同类型的"文物图典"，都参考了这个范式。

霍、卢：1992年，《中国铜镜图典》出版以后，反响很好，影响也较广。您能不能站在作者的角度谈谈看法？

孔祥星：是的。除了文博考古界需要参考利用外，《中国铜镜图典》的出版正好赶上20世纪末兴起的中国民间收藏热，不少民间铜镜收藏家及古玩商都要买这本书。有了这本工具书，铜镜所属时代、纹饰内涵、铭文考释等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2020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增加了数量较多的铜镜图片，特别是考古出土的资料，由于研究铜镜铭文的鹏宇博士也参与了修订，铜镜铭文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

霍、卢：据我所知，您在铜镜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孔祥星：的确。1998年，孙关根又与我共同策划一套研究"文物通论"性质的著作。他约稿的许多"通论"著作都相继出版。遗憾的是，虽然我与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后改为"故宫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由于文化部任命我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法人代表，主持行政、业务工作，事务繁忙，无法从事撰写工作，只能违约了。

"通论"策划初期，大致规定了多少文字，配几十张图。我执笔的《铜镜通论》设想是完全按考古学的格式，记述每个历史时代的铜镜型和式以及这些类型的分期，铜镜的纹饰内涵、铭文系列，而且每个专题先列出此前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再提出我们的看法。因此，章节结构极为特殊，配图就特别多，可能有六七百张图。孙关根也同意了我的设想，铜镜通论可以不按其他几本通论的规范去撰写，给予我充分发挥的余地。

2002年退休以后，我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写了26万字，准备了六七百张图。没有料到的是，2003年5月，我应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历博党委书记谷长江之邀，被聘任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顾问、专家组组长，协助筹建恭王府博物馆。为什么他们还要给我一个"专家组组长"头衔？其实是为了避免"顾而不问"，商定我每星期去恭王府上班一天。上班第一天，情况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恭王府几乎没有博物馆专业人员。从此，我不仅每天上班，尤其是第一年假日还经常加班工作，恭王府专门给我配了司机和汽车，一直工作到2008年底解聘。

我在恭王府应聘期间，请一位助手帮我将《通论》的文字和插图输入电脑中，2009年准备重新完成通论文稿时，才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26万字输入了电脑，插图一张没有，而且还遗失了数百张图。

除了这个原因，当时铜镜领域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对铜镜重要性认识的提高，铜镜收藏气氛浓烈，铜镜价格一路上扬。除一些文博考古单位出版铜镜图录外，拍卖公司印刷的铜镜图录、民间藏家出版的藏品图录、铜镜鉴赏、铜镜价格、铜镜大全等五花八门的铜镜著作纷纷上市。面对着这些眼花缭乱的出版物，作为一个研究铜镜的文博学者，我深深感到必须提高铜镜鉴真辨伪能力、铜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很可惜，如果铜镜通论在2003年前后出版，还是很有用的，因为那时一般人很少能看到国外出版的著作。

如此丰富的考古出土资料和传世品铜镜让我感到十多年前撰写通论涉及到的许多问题需要修改，尤其是铜镜类型的划分原则更为复杂，修改的任务较重。前几年，我希望霍宏伟能参与修改《铜镜通论》的项目，他看了原稿觉得很好，也开始了修改工作。由于我需要修订《铜镜图典》，他也有其他的业务和行政工作，目前还没有定稿。

可以说，铜镜成为我的一个最主要、最有影响、个人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于是我个人的科研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很快转到铜镜。连日本学者都觉得奇怪，说孔先生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怎么又去研究铜镜了？

霍、卢：的确跨度比较大。正好通过这次访谈，您也回应了此类疑问。刚才说了您与刘一曼老师两个人合著铜镜书的缘起、思路及著作的影响等内容，那么，我想追问一下有关铜镜研究评价性的问题，您是如何认识中国古代铜镜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呢？

孔祥星：我一直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考古文博学者不是很重视中国古代铜镜研究。这里只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十几年前，国家文物局一个重点展览项目由某地方博物馆中标承办，该展览聘请了四位学者担任顾问，分别指导茶具、酒具、漆器和铜镜四个专题，我负责指导铜镜专题。在召开第一次讨论会时，一位著名的文博专家直率地说：这样的展览很重要，更贴近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但是展览设计的四个专题，就像一张漂亮的桌子，三条好腿，一条瘸腿。他说的这条瘸腿是什么？铜镜。当时让我感到非常不理解，立即作了发言。这位学者写了不少著作，知识面广，是我很尊敬的学者。他也写了一些铜镜文章，是我们撰写铜镜著作的重要参考。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铜镜不应该与古代酒具、茶具等文物同置于这么重要的展览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应该说与铜镜本身的特质和我们对铜镜的认识有关。你们看，在考古、文物类刊物所编辑的总目索引中，铜镜归于哪个目录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铜镜形式简单，圆形的、方形的，最多在圆形基础上变成葵花形、菱花形，有的加一根手柄，但都是平面几何形状。尺寸一般不大，色彩极其单调，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少铜镜纹饰细密繁复。战国、汉唐铜镜还比较精美，唐以后由于只重实用功能，加上铜镜合金成分的变化，许多铜镜背面看到的不是商标铭文，就是简单的吉祥铭文，到民国年间铜镜更不受重视了。最近我看了一些博物馆收藏的传世铜镜，许多铜镜锈蚀较重，纹饰铭文难以辨识。的确，从展览的角度看，铜镜没有酒具、茶具、历代漆器巧变的造型，也没有酒具、茶具晶莹的质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色泽和漆器丰富的色彩。

霍、卢：相较于书画、瓷器、金石这些门类的研究，铜镜研究起步晚。

孔祥星：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文博学者开始关注铜镜，一些地方相继出版了铜镜图录，研究铜镜的类型学、年代学。尽管发表了一些资料，但出版的格式是一张铜镜背面照片和一个说明。因为照相条件限制和铜镜本身的特点，照片不清晰，没有多少艺术审美价值。前两年，还有重要的城市博物馆出版的铜镜图录，很多图片模模糊糊，我真不明白，出版这样的著作目的是什么？

关于举办铜镜展览，我的评价是成功的不多。策展人容易进入一个误区，觉得铜镜展览简单，尺寸小、分量轻，展陈较安全。按铜镜时代发展序列陈列，往往在一个展柜中摆上十几面、几十面铜镜，加上一张简单的文字说明牌就可以了。没有在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上下功夫，没有利用拓本、特写等辅助展品的功能，去充分展示铜镜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观众走进展厅，放眼望去，数十面、数百面铜镜，白亮亮、黑乎乎，千篇一律。如果灯光调整不好，纹饰铭文看不清，极易引起视觉疲劳。观众走马观花，很快就离开了展厅。

实际上，关于铜镜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我这里只能列举极少的几个例子。科技方面，现在仍然有好多问题没解决。如日本学者曾经参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出土铜镜的研究。三船温尚等对该所收藏山东地区出土488面战国、汉代铜镜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青铜镜工艺、技术的考察》。文中感叹道：最初认为铸造小小的圆板形铜镜，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高难技术，可是一旦进入“铜镜的世界”，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铸造知识和经验范围，要解开铜镜的谜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日本学者对丰富的出土资料进行了研究，但在许多技术问题上，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文中发出的感叹对我们应该是很好的启发，因为我国学者在铜镜铸造技术及工艺的研究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为此，我参加的市民讲堂讲座题目就用了《走进铜镜的世界》。具体的铸造问题就不再举例了。

霍、卢：那您认为已有的铜镜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步的地方吗？

孔祥星：对，在铜镜的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铜镜铭文的书法基本没有人研究，纹饰也很少有人涉及。例如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的，除文献外，汉代画像石资料等都有学者引用，但却很少提到铜镜。其实铜镜中有的图纹很重要。如大家熟悉的西王母，在西汉晚期博局(规矩)纹铜镜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西王母的图像，但其形象及其在图纹中的位置很不显眼，多与玉兔捣药组合在一起；在东汉中期的画像镜、神兽镜中，西王母则与东王公组合在一起构成主体纹饰，形象突出。我认为由于汉代铜镜分期比较明确，西王母纹饰在汉代铜镜中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证明了西王母信仰和崇拜在东汉时期最为盛行，这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

对铜镜的研究越深入，越能感受到它所处时代的文化气息、时代氛围，更加觉得对铜镜的研究、出版和展览等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考。李学勤老师生前多次对我说，不仅要看文博考古单位考古出土和收藏的铜镜，也要重视民间藏镜，他曾多次在北京或外地鉴赏民间藏镜。对于出版铜镜著作，他强调照片一定要清晰，要放大一些，能制作拓本的，要拓得精美，铜镜说明可以少写一点，写出要点、特

点就好。

我明白李老师肯定是自己对着照片和拓本考证铭文，如果照片看不清，又没有拓本，作者考释正确与否也无法判明。所以，后来我建议一些作者出书的时候，一定要把照片放大，拓本尽量拓得精美。有一本在我们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同仁协助下出版的铜镜著作，照片清晰，拓本较精美，纹饰铭文清楚。李老师看了特别高兴，连连说好，还指着图片说，汉代铜镜纹饰中有很多神仙人物、珍禽异兽，写起来不就有很多故事，铭文有许多内涵可以研究，对不对？

李老师说得非常中肯，过去少有人去写铜镜的这些方面。现在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写铜镜的比较多了，像汉代铜镜铭文就有专著出版，过去哪有专门研究铭文的。因为现在出版考古发掘铜镜资料和公私收藏铜镜的著作多了，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多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眼界、多维思考的契机。

霍、卢：可以看到，现在重视铜镜、关注铜镜的人明显多了。

孔祥星：前面我已经谈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再补充一些。那时文博考古单位出版的铜镜著作多了起来，民间藏镜著作和铜镜拍卖图录也不少。有的铜镜图录说明就抄我们的图典。毫不客气地说，像程林泉、韩国河的《长安汉镜》、蒋宏杰的《南阳出土铜镜》和霍宏伟、史家珍的《洛镜铜华》这样下功夫去研究考古出土铜镜的著作很少。

有些作者请我指导或提意见，我就建议他们出书不要再重复老一套了。我们的图典是一本工具书，尽量写得规范化、标准化，所以要较全面地描述，从形制开始，再从里到外，由镜钮介绍到镜缘，描述纹饰、考释铭文，连一些细部都写出来。你们的书如果能将铜镜的纹饰、铭文、形制等特点加以重点描述，这不就有创新点了嘛。

所以，只要系统、全面、深入研究铜镜，不仅对考古学的年代学有重要意义，对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宇宙观、社会风俗、社会生活这些方面的研究也能提供实实在在的资料。如汉代流行的博局镜，也称为“规矩镜”，关于此类镜的名称和寓意竟有十几种不同观点。从里到外，对主题纹饰、辅助纹饰、边缘纹饰、铭文、钮、钮座及乳钉都需要进行精细化分析。尽管有分歧，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博局镜的内涵十分丰富和深邃。

关于中国古代铜镜认知的发展史，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一开始，虽然罗振玉对铜镜有精辟的评价，但提到铜镜就只想到汉唐。随着考古出土资料的增多，人们发现战国时期还有这么丰富的铜镜。1934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进行发掘，墓葬中出土了一面铜镜，他在日记中特别写到“重要发现”：铜镜。但是否是铜镜，学者有争论，因为周代没有出现铜镜啊！直到1975年，安阳妇好墓出土了4面铜镜，证实了商代已有铜镜。同时，齐家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铜镜，从齐家文化到明清时代，铜镜的历史延续了4000多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霍、卢：古代有铜镜相关研究著作吗？

孔祥星：宋代金石学的著作中，就已经收入铜镜。清代由于皇室的重视，出版了一些铜镜著作。但是，我们发现金石学家的著作，只欣赏有铭文的铜镜，类型尚不够丰富。如汉代草叶纹镜虽然有的没有

铭文，但草叶与蟠龙巧妙组合，构图多有变化。但著作中基本上收录的都是带有铭文、草叶对称、格式单一的，给读者留下了很单调的印象。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多看考古出土资料和传世资料，深入研究铜镜丰富的类型和内涵，注意铜镜的细节。因为铜镜虽然小，但是它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集中了典型、精华的情景、意境。

霍、卢：接下来我想提一个方法论问题，您是如何将唯物史观应用到具体的文博和考古研究当中的呢？

孔祥星：这是理论上总结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像我们研究铜镜，当时最主要的是总结此前国内外研究状况后，感到我们在类型学、年代学方面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所以这方面成为研究重点。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我们又在铜镜的研究、出版、展览等方面作了一些理论的探讨，对铜镜背后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进行了多个领域的研究。

霍、卢：好的，那我们回到研究的进展，您第一阶段的研究是吐鲁番文书、第二阶段是中国古代铜镜，那么，第三阶段您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孔祥星：第三阶段，清代王府研究。我退休以后到恭王府工作了近六年。聘请我去恭王府，是为了筹建恭王府博物馆，但是当时恭王府仅仅开放了花园，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游客来此主要是逛逛和珅居住的地方，看看和珅的藏宝楼，我考虑了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历史复原陈列和临时展览的方案以及经费预算，关键是展览中陈列文物的经费预算。文物的经济价值怎么评估呢？我们当时按照北京两家著名的拍卖公司竞拍清代文物艺术品的成交价作为参考。我设计的方案得到评审专家的肯定，故宫博物院专家说设计这个方案的一定是我们博物馆的人，很熟悉陈列展览的内容设计流程。参加评审会的审核经费预算公司的杨经理也对我留下了好印象。巧合的是，后来国家文物局可移动文物修复经费审核的也是这家公司，杨经理曾多次邀请我去担任审核专家组的组长。我去恭王府的时候，管理中心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修缮王府府邸建筑，以达到府邸和花园全面开放的目的。前面我提到，那时恭王府没有一位学习、研究清史的业务人员。所以，我去了以后首要的工作任务变成了为恭王府府邸修缮及今后的陈列展览收集老照片、老资料。

霍、卢：您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同时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内容设计者，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孔祥星：通史陈列设计是这样的，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要求。我从干校回来时候搞陈列，就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和红线，这是当时的一个指导思想。当年的设计流程跟现在大不一样，馆长就是总体组的组长，各研究室如隋唐宋元研究室、明清研究室的人员分别负责内容设计工作。具体内容框架是陈列主题思想，再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单元，如经济单元中又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列出单元标题和内容，提出需要展出的文物，撰写文物说明。美工部根据内容设计文稿，提出形式设计方案，提交总体组讨论通过。现在还有总体组吗？

霍、卢：没有，只有策展人。后来您两度出任副馆长，承担着很重的行政工作，方便分享一些这方

面的经历和其中与考古文博领域有关的故事吗？

孔祥星：好的。在这里，我谈谈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1984年，经过历博的民意投票和上级的考察，任命我担任历博的副馆长，那时应是文化部较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为了培养我，馆长分工时让我负责人事和外事工作。派人出国、评职称、推荐上大学学习都是我管理的范围，没想到在当时这些工作会涉及到许多利益，引起许多意见。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公派出国很不容易，提名谁出国都是很敏感的事情。作为一名北大的研究生，我一直是很想做研究工作的。外事、人事都由我管，实在是承受不了。任命我担任副馆长时，我就表态只干一届行政工作。于是，1988年，我就向文化部写了三次辞职报告，文化部同意了我的请求。

那时，正好文物局拟调北京大学考古系俞伟超教授来我馆任职，因为我管人事，所以我就尽快地办理调动手续。俞伟超老师调到历博，担任馆长。俞老师一直从事考古教学工作，他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师，在考古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出色的研究成果，知识面广，并相继推进了我国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的发展。来历博之后，俞老师涉足了一个新的领域——博物馆的业务，为此，他希望我协助他搞好陈列展览工作，让我回到了唐宋元研究室当主任。那是科级干部，博物馆就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孔馆长的神经有毛病，局级干部不当，回来当科级干部了！回到研究室后，我能专心研究业务、设计展览，发挥自己的研究专长。

霍、卢：俞伟超先生接手了后续工作？

孔祥星：俞馆长来负责主持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此次修改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较大的改动，而且连1959年开馆以来使用的展柜都换了。

此前的陈列展览里特别突出了一些语录和标语口号，大版面的绘画位置突出、十分醒目。辅助展品也特别多，内容方面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突出农民起义，因为缺少这方面的文物，只能制作一些大的雕塑，扩大场景。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等场景占了展厅很大的面积。可以看出，当时设计陈列内容时，在辅助展品上下了很大功夫，较少考虑如何充分展示文物。另外，由于对博物馆宗旨和性质的认识，展览里面各种表格也较多，许多表格是经过高度概括的，简明扼要，特别适合学生参考利用。尤其是那些考大学、考高中的学生边看边抄。所以，那些教育系统的教师，特别是中学老师，比较喜欢这样内容和形式的展览。1972年重新开放时，虽然做了改陈，但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改变不大。

俞伟超馆长主持修改的陈列，撤除了许多大的语录、画作、雕塑、模型及表格等辅助展品，像殷墟武官村大墓模型、都江堰水利模型、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场面等，或撤除或修改。当时我总结了一句话：“突出了文物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的思想认识也有不同，强调了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要展示藏品，通过这些精美的文物，让观众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过去因为各种原因，一些重要的文物怕丢失、怕损坏，怕承重超标，所以复制品多一点。像我馆收藏最重要、观众也最感兴趣的后母戊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都是复制品，石膏做的，时间一长，有的地方露白了。俞馆长特别强调一个观点，外地的观众来北京，外国的观众千里迢迢来我们馆，看到的一些重要文物都是复制品，不太合适。所

以，这次修改陈列，俞馆长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历博收藏的一级品文物，只要是能够展出的，尽可能展示。大家觉得有道理，我认为这也是社会变化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变化。你既然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把一级品展示出来，突出文物的特点，让观众看到许多中国的历史文物，传达丰富的知识和艺术之美。所以陈列展览必须跟上时代的要求，根据时代的需要，改变叙述方式和陈列方式。

霍、卢：受益良多。非常感谢孔先生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附记：本文为孔祥星先生于2023年10月12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青铜器研究所接受采访所作。霍宏伟与卢宇共同参与采访。

[孔祥星，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
卢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办公室，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

（责任编辑：袁怡然）